

第二章 亞太地區軍備轉移與控制概況

俄羅斯在對外輸出軍備時，首先要考慮到國際因素，在現實的國際環境中，有哪些因素會限制俄羅斯對外銷售軍火？本章將分做兩小節來探討俄羅斯對外軍售中的國際環境因素，在第一節中將探討亞太軍火市場的概況，並探討亞太軍火市場與國際軍火市場的關係，並試圖分析俄羅斯與亞太軍火市場之間的關係，說明為何俄羅斯重視亞太軍火市場的經營，而在亞太軍火市場中，俄羅斯所扮演的角色為何；另一方面，本文將在第二節探討亞太地區軍備控制的議題，探討在軍備控制的議題之下，俄羅斯對亞太軍備輸出有哪些限制，俄羅斯又如何在這樣的限制之下經營亞太軍火市場。



第一節 亞太地區武器轉移概況

國際武器轉移是指國家之間的軍事援助以及國際進出口貿易中的軍品貿易，而在軍火交易中，主要是以信用貸款、現金交易、以物易物、贈與以及技術合作的方式進行。本節討論的武器轉移概況，將以傳統武器為主，其中更包含雙重用途的軍事裝備（dual use），而為了建造防禦工事所付出的費用以及為獲取軍事設備的出口許可證所付出的費用，都將會被計算在武器採購的金額當中。

國際間的軍備轉移與軍備控制是兩項極為重要的議題，在冷戰結束之後，亞太地區成為世界上最主要的武器輸入地區，除了跟這一地區仍然存在許多冷戰時期的問題外，亞太國家在經濟上普遍都有不錯的表現，使得亞太國家都具有不錯的購買能力。

一. 亞太地區傳統武器轉移的演變與特色

亞太地區自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武器的來源便由美蘇兩大強國所壟斷，並且控制亞太地區武器轉移的條件，而在戰後初期，由於美蘇累積了大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製造的武器裝備，而這些裝備便成為戰後美蘇兩國軍事援助的籌碼，並用以對抗對手陣營的工具。

隨著冷戰情勢的變化，美蘇兩國對外軍售的數字也逐年升高，到了 1965 年，美俄兩國對於軍備的輸出金額已是 1950 年代的 9 倍¹，同時受到韓戰與越戰的影響，亞太地區的軍火輸入也是節節攀升，特別是越戰，美蘇兩國都將當時最先進的武器送往戰場，這也使得亞太地區在 1970~1975 年間的武器進口總額高達 330 億美金。

亞太地區的武器轉移，自冷戰後期、越戰結束之後，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越戰結束至 80 年代後期）

此一階段的幾個主要特點是：

- (1) 亞太地區的武器進口數目，自 1970 年代後期之後持續攀升。由於美蘇對於第三世界的經營日趨積極，因此自 70 年代中期以後，便開始大幅度增加對第三世界的武器出口，亞太地區的武器交易額成交額創下新高，達到 102 億美元²。
- (2) 在此時期的軍備轉移中，亞太地區所引進武器的品質也有大幅度的提高，除了因為過去所引進的裝備多為二次大戰的替換軍品，品質上不如美俄現役裝備，也因為在戰略上的實際需要，美俄此時期所輸出的軍備已經與現役的裝備無太大的技術差距有關。
- (3) 除了美蘇兩大武器出口國外，英國、法國與以色列也開始加入武器外銷的市場³，美蘇在國際軍火市場的市場占有率開始下滑，相較於 60 年代在第三世界的 75% 市場占有率，到 80 年代已下降到約 60%，但成交額仍然相當高。
- (4) 美國對於亞太地區的軍備轉移已由過去的軍事援助漸漸轉型為商業性的銷售為主，而蘇聯出口武器的型態則未發生較大幅度的轉變，仍以軍事援

¹ Frederic S. Pearson *The Global Spread of Arms-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estview Press 1994) p.24.

² 夏立平，《亞太地區的軍備控制與安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6 月)，頁 379。

³ 李明正，《美國、俄羅斯、歐洲地區、中共與以色列之軍事工業發展趨勢探討》，(台北：時英出版社 2001 年 6 月)，頁 192。

助的型態，用貸款的方式提供盟邦武器。

- (5) 由於英國、法國、以色列等新興武器出口國的崛起，亞太地區的軍火市場競爭日趨激烈，使得武器具有議價空間，但是賣方市場的趨勢仍然沒有發生變化，仍然由美蘇兩大強權主導國際軍火市場的遊戲規則。

第二階段（蘇聯解體至今 2002 年）

此一階段的主要特點是：

- (1) 冷戰結束初期，亞太地區軍備轉移的數字略顯下滑，但到了 90 年代中期之後，便又開始恢復攀升的趨勢。

自蘇聯瓦解之後，全球的軍費支出有下滑的趨勢，從 1988 年起的 1 兆零 66 億美金逐步下滑到 1998 年的 7450 億美金，不過從 1999 年起又開始止跌回升，1999 年的世界軍費總數回升至 7900 億美金。

同時，根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中心（SIPRI）的估計，1999 年當年的世界軍火生產總值約有 2000 億美元左右，其中美國更佔全世界軍火產值的 50%，俄羅斯則只有美國的一半，僅有 26% 的產值。國際軍火交易市場，在 90 年代中期之後開始回穩，其中原因與俄羅斯有密切的關係，俄羅斯在經歷國防工業轉產未如預期之後，又轉回積極投入國際軍火市場的競爭，藉由大量對外輸出軍火換取外匯以提振俄羅斯低迷的景氣。

亞太地區傳統武器的進口值，從 1988 年的最高峰開始逐年下滑，到 1994 年為最低點，僅有 59 億美元，而 1995 年之後又開始逐步回升，1997 年的軍火交易額已有 123 億美元，約與 1988 年的最高峰相當，1998 年度亞太地區的軍火交易額更佔全球軍火交易額的 49%，其中東北亞地區的軍火交易額更佔全球軍火交易額的 30%⁴。

- (2) 美俄兩國向亞太地區輸出大量的軍備。

冷戰結束初期，美國成為唯一是超級強權，趁俄羅斯尚未站穩腳步之際，積極拓展海外軍火市場，向外推銷各類美軍裝備，美國總統柯林頓更在 1995 年頒布有關軍火出口的命令，表示對外出口武器是美國向外推行其外交政策的合法工具，而提高美國在國際軍火市場的佔有率也是美國的外交政策目標之一⁵。因此自 1991 年起，美國便一直是國際軍火商的龍頭，武器出口額一直保有 50% 以上的市場佔有率，其中 1995 與 1996 年的軍

⁴ SIPRI, Arms transfers database, <http://www.sipri>.

⁵ 夏立平，《亞太地區的軍備控制與安全》，頁 381。

火出口額更超過 200 億美金，佔全球軍火市場的 56%與 55%⁶。而美國在 1994 年至 1998 年的軍售銷售總額則高達 539 億美元，排名世界第一，俄羅斯則跟在其後，成為第二大軍火輸出國，並且俄羅斯的對外輸出對象更以亞太地區為主，中國、印度都是其主要買主，近來俄羅斯更積極拓展市場，除原有的市場外，更將市場觸角伸向東南亞，而這也使得亞太地區的軍火交易額居高不下，成為新的軍火庫。

(3) 商業考量與戰略考量成為輸出武器的主要考量因素

在冷戰結束之後，武器的交易中，對於經濟利益的考量越來越重視，亞太地區軍備轉移中的商業化傾向更為明顯，以俄羅斯為例，俄羅斯無了出售武器給與過去的盟友之外，更積極開發新的客戶，而這些新的客戶更包含過去冷戰時代的對手，如南韓就是俄羅斯軍火商積極爭取的新市場。而在經濟因素的考量下，戰略因素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如俄羅斯在出售武器給予中國時，便有著地緣政治上的考量，並不願意售予中國最先進的武器系統。同樣的，美國對於亞太地區也是同時存在著這兩種考量，為了經濟上的利益，美國積極的向亞太地區出售武器，但基於戰略以及政治上的因素，而對武器的內容與數量則有著限制。

(4) 武器生產的跨國合作日趨頻繁

在冷戰結束之後，武器生產的全球化是一種趨勢，跨國合作主要的考量是基於成本與效率，這種跨國間的合作可以分為四種形式：授權生產、合作生產、轉包生產、聯合研發。例如，1999 年 11 月，俄羅斯與印度簽署協議，根據協議，俄羅斯將會授權印度生產蘇愷-30 戰鬥機、飛彈發射系統以及潛艦；台灣的經國號戰機（IDF）也是一種國際合作的產品，在研發的過程中，有相當大的比例是來自美國的設計概念⁷，而美國也授權台灣生產雷達系統與發動機；台灣的漢翔公司也負責承包美國貝爾公司 OH-58 戰鬥直升機的機身，也透過工業合作的方式，為 Bell-412 型直昇機研發膠合板。

(5) 亞太國家武器的自製率提高，減低對於軍購的依賴

亞太國家近幾年來在工業能力與科技研發能力快速提升，也帶動武器的研發能力，在武器的設計與仿製能力上有長足的進步，日本、中共與印度便是最好的例子。

日本在 1993 年後的武器進口額便開始逐年下降⁸，但是國防支出並未下降許多，其原因在於日本武器自製率的提高，使得依賴國外進口武器的程度

⁶ Anthony H. Cordesman *The strategic impact of Russian arms sales and technology transfers* (CSIS: 1999 Apr.) p.8.

⁷ 翁明賢，《全球化時代的國家安全》(台北：創世文化出版社 2002)，頁 211。

⁸ 謝淑媛，「亞太軍火競賽」，《後冷戰時期亞太集體安全》，(台北：業強出版社 1996)，頁 117。

降低，而日本軍火製造廠近年來的完工水準越來越高，而這也使得日本的武器系統有 90% 是由日本所自行生產。日本對於武器的研發也有相當高的投入，除了高達 13 億美金的國防研究經費外，日本更與美國合作開發 FSX 戰機並且更自行設計開發軍用偵察衛星，日本的三菱重工更躍居亞洲最大的軍工企業。

中共在 1958 年與蘇共決裂之後，便開始發展期武器自製的技術，不過仍以模仿俄製武器為主，並非開發新型的武器，近年來在民族主義與經濟誘因的驅使下，中共更積極開發新型武器，並且積極提升其仿製的技術，不過在軍用發動機的仿製技術上仍然有待加強。

而印度在俄羅斯的積極援助下，除了授權印度生產高科技武器外，更幫助印度發展自身的軍火工業，也因此印度具有相當高的武器仿製能力，除了成功的試爆核彈之外，今年來更積極發展航空母艦的製造技術，盼望可以提升遠洋作戰的能力，並牽制中共往印度洋發展的野心。

二. 亞太地區傳統武器的市場分析

(一) 亞太地區傳統武器的市場結構

亞太地區傳統武器市場，根據 Pearson 所提出依買賣國家的性質來區分⁹，可以分為四個主要的類型，即已開發國家間的軍火交易、開發中國家對已開發國家間的軍火交易、已開發國家對開發中國家的交易與開發中國家間的軍火交易。

1. 已開發國家之間的軍火交易

已開發國家之間的軍火交易由來已久，其中交易的項目大多以高科技武器為主，並且在軍事盟國之間的武器交易限制較少，使得已開發國家之間軍火交易額在全世界的軍火交易額中佔有較高的比重，不過也由於已開發國家逐步發展自有的軍火工業，使得已開發國家之間的交易額有逐年下降的趨勢。

在亞太地區，已開發國家之間的軍火交易所指涉的對象是美國對日本以及澳大利亞之間的軍火貿易。日本與澳洲都擁有美軍所配備的第一線武器，例如 F-15 與 FA-18 都是美國目前空軍與海軍所服役的機種，並且美國更與日本進行武器生產技術上的交流合作，藉以提升彼此的技術，並且降低研發生產武器的成本。例如美國便與日本合作開發以 F-16 為基本架構的 FSX 戰機，並且更合作發展戰區飛彈防禦系統 (TMD)，而日本所擁有的頂尖的電子、光學等技術元件也被運用在美國的高科技武器上，例如美國的愛國者飛彈的導航系統便是來自於日本的技

⁹ Frederic S. Pearson *The Global Spread of Arms-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64.

術。

2. 已開發國家對開發中國家的交易

已開發國家向開發中國家進行武器轉移的交易數量，自 1960 年代起，便一直佔有整個國際軍火交易市場的 50% 以上，到了 1997 年更高達 70%，而開發中國家所擁有的武器系統也多半來自這些已開發國家。

在已開發國家向亞太地區發展中國家的武器出口中，美國與俄羅斯是最大的兩個武器來源，而美國更遠遠超過俄羅斯在亞太地區的市場佔有率，不過近年來俄羅斯積極開發亞太地區的市場，原先採用美國武器系統的國家也開始漸漸提高對俄羅斯武器的接受度，例如馬來西亞便開始向俄羅斯採購新型的米格-29 型戰機，而菲律賓也計畫採購俄羅斯所生產的改良型 MIG-21¹⁰。

在已開發國家對開發中國家的武器出口中，便會依據戰略考量以及友好程度而有技術層次上的差距，例如美國出售給南韓的 F-16 在性能以及科技層次上都優於出售給台灣的 F-16 A/B 型戰機¹¹，而俄羅斯出售給印度與中共的武器也存在著類似的差異，俄羅斯出售給中共的戰機，基於安全上的考量，並未給予最先進的配備，但俄羅斯出售給印度的武器裝備多半都是最先進的，甚至還超過俄羅斯本身所擁有的水準。除此之外，美俄等軍火大國也會向亞太地區推銷其上一世代的軍火，藉此以消化過多的庫存軍火，例如美國出售給台灣的 M-60 坦克便是美軍上一世代的武器裝備，美國便以較低的價格出售給台灣，俄羅斯也出售改良版的 MIG-21 給予經濟能力較差的菲律賓與越南，除了可以提升俄羅斯與其的關係外，也可以或多或少增加俄羅斯的外匯收入。

3. 開發中國家間的軍火交易

自冷戰時代開始，就有著開發中國家之間的武器轉移的情形，而這一類的武器轉移多半是二手武器市場的轉移，例如台灣就接收自歐洲退役的 F-5E/F 戰機，在將所汰換的戰機轉賣給經濟能力較差的第三世界國家，而哈薩克也將自己所生產的 MIG-21 稍加整備之後，轉手賣給亞洲國家。

而自 70 年代開始，亞太地區的開發中國家開始出售自己所生產的武器，這一類武器多半沒有美俄武器大國所生產的先進，但往往憑藉較為低廉的售價來打開市場，並且亞太地區所開發出來的武器系統雖然仍以美俄所生產的武器作為藍本，但是在設計上已根據亞太地區的氣候因素進行調整，減少因為氣候因素而造成損失。例如，台灣所生產的自強號教練機就曾經銷售至新加坡，而自強號本身所具

¹⁰ "Russian Army Aviation in the Far East", *AFM January* (Jul 1999) p.16.

¹¹ 南韓所獲得的 F-16 C/D 型戰機，在引擎推力與雷達系統上，都遠優於出售給台灣的 F-16 A/B 型修改版。「F-16 家族與衍生機型」《全球防衛雜誌》第 211 期，頁 36。

有的優異性能，亦引起國際軍火市場的重視，但因為政治因素，而沒有辦法打開市場，另一個例子則是中共所生產的殲七-二型戰機，此機型是以俄製米格-21 作為設計藍本，並重新設計機體以改善滯空能力，雖然殲七-二型的引擎耐用度以及作戰能力受到軍事專家的質疑¹²，但殲七-二型仍相當受到第三世界國家的歡迎。

因此，開發中國家在國際武器市場的競爭上，仍然具有些許優勢，但市場的空間並不大，所佔的總額並不高。再加上美國近年來在海外發動的幾次戰爭，在國際媒體面前展示美軍裝備的優越，使得這些開發中國家在經濟許可的情況下，轉向採購美俄所生產的先進武器，因此近幾年開發中國家武器轉移的金額與數量都在下滑，在整個國際軍火交易所佔的比重也在逐步下滑。

4. 開發中國家對已開發國家間的軍火交易

開發中國家對已開發國家輸出武器是 80 年代以後才出現的，但在亞太地區這種情況並不常見，數量與金額都不高。但是，亞太地區的開發中國家向已開發國家出口軍備零件則相當常見，例如台灣的漢翔公司便幫美國貝爾航空公司生產軍用直昇機的特殊鈹件¹³，而南韓也幫美國通用動力公司生產 F-16 的機身鈹件與起落架等零件，而會有這種交易現象，與前述的軍工生產的全球化佈局有極密切的關係。

（二） 軍火交易對武器出口國的影響

對亞太地區武器輸出最多的國家分別是美國與俄羅斯，冷戰時期，美國與俄羅斯都將對外輸出軍火作為國家戰略的政策工具，因此在這種情形之下，軍火轉移中的經濟利益的重要性並不如戰略利益。冷戰結束之後，俄羅斯繼承了蘇聯瀕臨破產的經濟，面對國內經濟的困境以及軍工業轉產沒有得到預期的成效，因此改以積極對外出口軍火已獲取外匯，並一改過去以戰略利益為考量的交易，開始注重軍火交易所能夠提供的經濟效益，已獲取外匯為出口軍火的原則，但仍會考慮到俄羅斯的整體戰略，這將留到下兩章繼續探討。另一方面，美國在冷戰結束之後，反而更積極對外輸出軍火，為了要拉開美軍在科技層次上的優勢，美國投入更多的經費進行次世代的武器研發，藉由對外輸出武器來提供研發經費並增加國內的就業機會，並以武器的供應與否來左右他國的對外政策，因此對於美國而言，冷戰的結束對其軍火轉移的角色並沒有發生太大的轉變。

亞太地區武器市場幾乎被美國與俄羅斯所壟斷，除了台灣購入法國達梭公司所生產的幻象 2000 外，亞太地區的軍火幾乎都是美國與俄羅斯所出口，美國與俄

¹² 林宗達，《赤龍爭霸-中共跨世紀的軍事戰略與武力建構》，(台北：軍事迷文化出版，2002)，頁 82。

¹³ 翁明賢，《全球化時代的國家安全》，頁 211

羅斯也分居對亞太武器出口國的一二名¹⁴。90年代以後，美國軍火工業進行一連串的改組與重整，自1992年起，美國的四大軍火工業：洛克希德-馬丁、諾斯洛普-格魯曼、波音、通用動力開始陸續對中小型軍火企業進行兼併，透過兼併與整合使這四大軍火企業在國際更具競爭力。在俄羅斯，軍火工業也由政府出面，進行大型工業集團的整合工作，除了有助於增加俄羅斯軍火工業的國際競爭力外，也有助於穩定俄羅斯軍火的國際交易價格，避免因為國內對手彼此之間的競爭而破壞俄製軍火的市場行情。

在冷戰結束之後，國際軍火市場一直處於供過於求的狀態，911事件之後，美國發動以反恐怖主義為主軸的戰爭，使國際軍火市場又出現新的商機，更有陰謀論者指稱美國對外發動反恐戰爭是因為軍工複合體急於消化過剩的武器。美國的國防預算在2002年編列3600億，2003年編列4000億，預估到了2005年會成長到5000億美金，而逐年提高的國防經費支出，除了用於反恐戰爭，也將用於擴充各項軍備，並且加強高科技武器的研發工作。

而俄羅斯在冷戰結束之後也有著軍備過剩的現象，並且政府提撥給軍方的經費更是逐年下降，除了名目上的預算下降外，軍方實際所獲得的經費更低，軍火商為了求生存，紛紛降價求售，而軍隊走私軍火的情況則更為嚴重。近幾年經過政府的整頓與重視，俄羅斯的軍火工業才又恢復競爭力，亞太地區的軍火市場幾乎是俄羅斯軍火商的經濟命脈，特別是波斯灣戰爭、反恐戰爭之後，原先中東地區的買主大多受到武器禁運，俄羅斯因此必須更加依賴亞太地區的市場，中國、印度、馬來西亞都是俄羅斯所依賴的買主，也因此，如何平衡經濟利益與戰略考量，將會影響俄羅斯的國內外政策。

而武器出口國從軍火轉移中可以獲得的政治與戰略利益，一般而言主要可以分為：

1. 強化盟國與友好國家的軍事力量，進而加強軍購國與軍售國達成共同目標的能力，在與其他國家發生武裝衝突或戰爭時，提供盟國武器將會比直接投入戰爭所要付出的代價小¹⁵。
2. 軍備轉移的內容具有一定程度的象徵意涵，軍售國提供給軍購國的交易項目，能夠反映出兩國之間的友好程度，能夠公開宣示武器出口國對進口國的政治宣示與承諾¹⁶，而軍售國也能藉由軍售項目來表達軍購國間的友好程度差異與戰略意義，例如美國出售給南韓與日本的軍備項目就不盡相同。因此，軍售的政治意義往往大過經濟或軍事意義，軍售的內容往往可以看出軍售國與軍備國之間的政治關係。

¹⁴ SIPRI arms transfers database 2003.

¹⁵ 徐建國，《軍火貿易-國際關係中的特殊戰爭》（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2000），頁13。

¹⁶ 同前註。

3. 軍購國在戰場上實際使用進口裝備，將可以提供軍售國在武器實戰中的經驗，可作為日後修正武器缺點的依據。
4. 軍售國可以藉由軍備轉移，作為對軍購國施加政治壓力的工具，或藉由軍售來要求軍事基地的使用權或飛躍領空權等，前蘇聯與美國都是利用這種方式來獲取海外基地。

另一方面，軍售國亦可在軍售中獲取經濟利益，其中主要有：

1. 獲取龐大外匯，可以提供國內經濟發展所需的資源；亦可藉由以物易物的方式獲得軍購國較為低廉的資源。
2. 在國內市場對軍火需求度低時，可以藉由外銷來維持軍火生產線的運作，並可因此提供國內就業機會。
3. 藉由武器轉移能夠增加兩國政府之間的合作關係，而軍售所產生的外溢效果將可為兩國帶來更多非軍事方面的商業利益。

但是軍售也有可能為軍售國產生某些負面的影響，例如軍售國的此器科技即有可能因為軍購國的關係而流出，對手可藉由仿製等技術對軍售國進行反制，也有可能軍購國仿製出口國的高科技武器後，以低價外銷混亂市場，除了使軍售國在經濟上蒙受損失也使得軍售國在國家安全上遭受威脅。

（三） 武器交易對武器進口國的影響

自 1994 年起至 2002 年為止，在國際軍火市場中，前 15 大武器進口國中，亞太地區便有 8 個國家名列其中。其中台灣、中國、日本、南韓、印度更是主要的軍購國，其中台灣因為在這一段期間進行二代戰力的補強，軍購金額 134 億美金更高居世界第一¹⁷。

一般而言，軍購國在國際軍備轉移中，主要可以獲得的利益有：

1. 提升自身的國防實力並可獲得軍售國一定程度的技術支援。
2. 軍售對國際社會而言，具有一定程度的友好關係宣示與政治上的支持。
3. 如軍購國與軍售國之間能夠達成貿易補償協議，軍購國則能夠藉由增加出口的方式縮小兩國之間的貿易逆差。
4. 軍備轉移能夠以各種方式進行，其中技術轉移如授權生產，將有助於提升軍購國本身的科技技術，並且這些軍事科技亦能夠提升一般民用科技的水準。

但是相對於軍售國在出售軍備時所能夠獲得的龐大利益相比較，軍購國在對外採購時，將可能產生以下幾點負面影響：

1. 大量的引進高科技武器，將極有可能促使現有與潛在對手加速購買新的武器

¹⁷ SIPRI Arms transfers database 2003. <http://www.sipri.se/>

裝備，進而引發新一波的軍備競賽，在不再次加碼買進更多武器的狀況下，軍購國反而有可能會受到更大的軍事威脅。

2. 軍售國在出售武器的同時，極有可能附加某些政治條件，也使得軍購國受到軍售國一定程度的制約。
3. 軍購國必須準備大量的資金來購買軍備，即便所獲得的軍備是免費供應，但也必須為武器的後勤補給維修等工作進行準備，特別是冷戰之後，戰略性的提供武器的行為已是少數，多半的軍備轉移都必須以購買的形式出現。也因此，近年來的軍事採購案多出現在經濟能力較好的亞太地區。

因此，基於這些負面的影響，多數的軍購國仍然會以自行發展軍事科技作為第一選項，近年來，台灣日本都曾經積極發展過武器科技，而中共更早在與蘇聯決裂後就開始發展自有的軍火工業，其目的都是希望避免發生受制於人的情況，不過軍售國仍會儘可能以各種手段干預軍購國發展軍事科技，軍售國與軍購國之間的角力仍會繼續發生。

三. 亞太軍購的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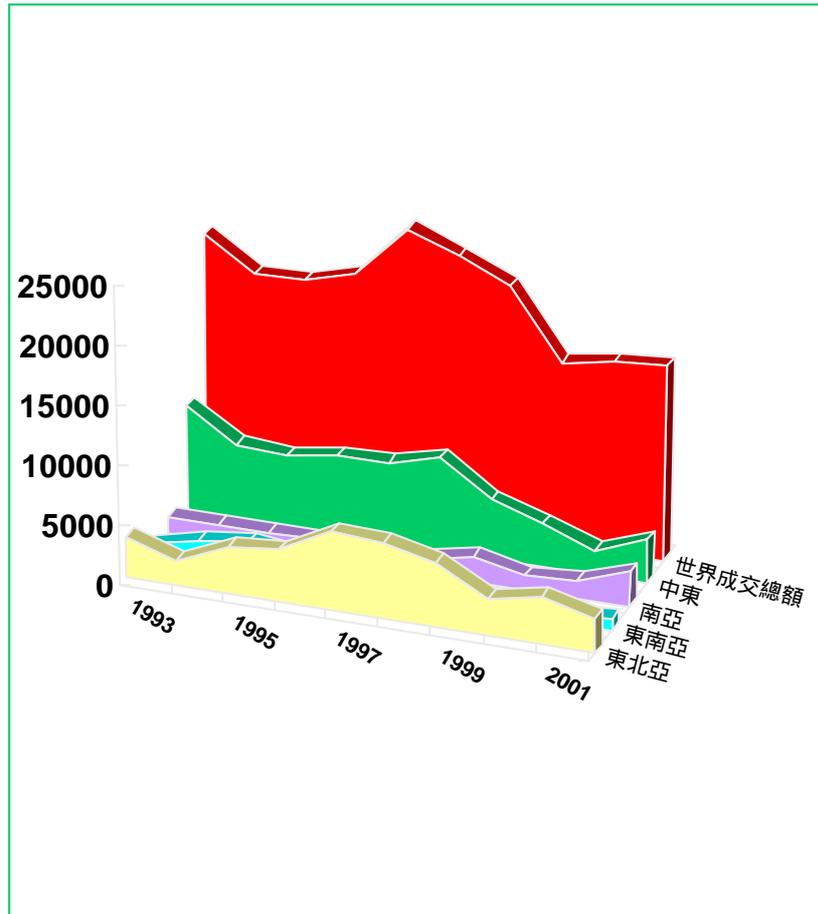
亞太地區在未來將可能持續進行軍備的採購，根據以往的數據來分析，本文假設亞太地區軍售將會受到下列的因素影響：

(一) 經濟能力將關係到引進軍備的能力與意願

近幾年亞太地區能夠積極的進口各種軍備與亞太地區的經濟能力有關，在金融風暴發生以前，亞太國家的普遍都有不錯的經濟實力，但是在金融風暴之後，亞太地區普遍都受到影響，購買軍火的意願與能力也都受到影響。

表 2-1 1993-2002 年亞太區域軍備採購金額

單位：10 萬美金



資料來源：SIPRI arms transfers database 2003, The volume of transfers of major conventional weapons: by regions and other groups of recipients and suppliers 1993-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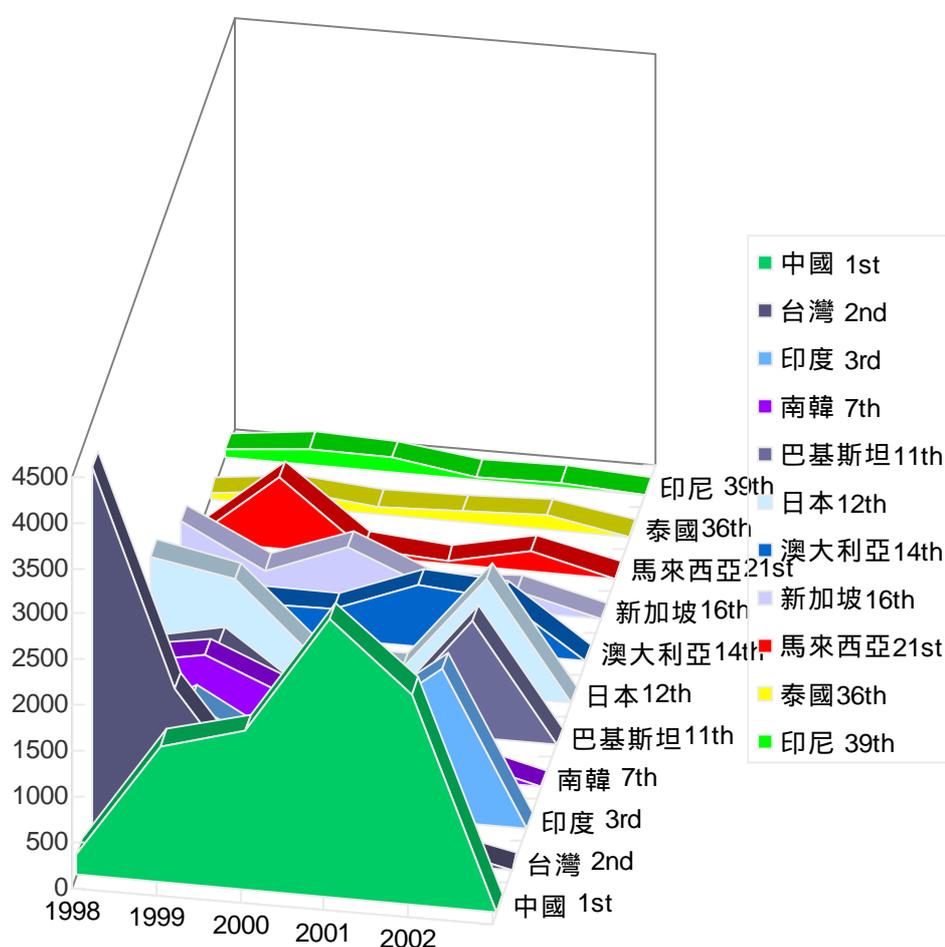
根據圖表 2-1 可以看出，大致可以 1998~1999 年作為一個分界點，在 1999 年之後，東北亞與東南亞都因為金融風暴的影響而減少軍備的採購，南亞的印度與巴基斯坦則是繼續維持相當高的軍購預算，除了兩國在金融風暴中所受的影響較小，兩國的關係也影響軍備的採購多寡。而近年來亞太各國的經濟逐漸走出金融風暴的影響，各國又開始積極的對外採購軍備，除了台灣南韓外，東南亞的印尼與馬來西亞也都有大動作的補強軍備，這都可以顯示出軍備的採購案與國家的經濟實力有很大的關係。

(二) 軍購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將影響採購武器的意願

除了經濟因素之外，軍購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將會影響軍購的行為，越緊張將越會促使軍購國增購軍備的意願，而這種情形在亞太地區更是明顯，如附表 2-2：

表 2-2 1998-2002 年間亞太各國軍購金額比較

單位：10 萬美金



資料來源：SIPRI arms transfers database 2003, The volume of transfers of majors conventional weapons: by recipients and suppliers, 1998-2002

可以看出，區域中兩國之間的關係會影響國家購買軍火的行為，中國與台灣兩國之間的關係一直處於緊張的狀態，並且也都有相當不錯的經濟實力，所以在軍購的排行榜上高居一二名，北韓週邊的日本與南韓也是處於一種緊張的狀態，而南亞的印度與巴基斯坦也因為邊界問題而處於緊張的對峙狀態，並且印度與巴基斯坦先後試爆核彈，這將使得這一區域的緊張情勢更為升高。而東南亞的情勢相對於東北亞與南亞而言，是較為緩和的情況，在加上因為金融風暴的關係，使得東南亞國家在購買軍備上較為保守。

（三） 亞太地區的軍火市場仍會是賣方市場導向

最後一個趨勢則是亞太地區的軍火市場仍會是以賣方市場為主，雖然各國有購買軍備的需求，但是軍購案的成交與否，仍然掌握在賣方的手上。

目前國際軍火市場仍然掌握在美國與俄羅斯兩大出口國手上，特別是美國掌握了世界前十大軍火商中八席，美國絕對有能力控制國際軍火市場，軍購國必須與美國維持一定的友好程度才能夠獲得軍備，美國不僅能夠決定軍售的價格，也能夠藉此影響軍購國的國內與外交政策，雖然美國本身也需要軍購訂單以維持國內經濟，但是基本上仍然是以賣方市場為主。而俄羅斯雖然比起美國更需要軍購訂單，而且對於軍購的態度更為積極，不過軍購的主導權仍然掌握在俄羅斯手上，俄羅斯可以決定要賣出軍備的內容，亦可以決定軍購的付款方式，這可以從俄羅斯在對中國與印度軍售時所出現的差異可以發現，這樣的差異將留到下一章節繼續討論。

不過就整個國際軍售來分析，軍售在未來仍然會繼續以賣方市場為主，軍備的需求並不會因為冷戰的結束而萎縮，各國仍會維持一定程度的軍備採購，而這也牽涉到許多原因，包含心理因素、安全因素、甚至是軍工複合體的陰謀論，不過這已超出本文所要探討的範圍。下一個小節我們將討論相對於軍備轉移的概念-軍備控制，探討亞太各國軍備控制的概況，並在第三章探討俄羅斯出售軍火至亞太地區時所要考慮的區域因素。

第二節 軍備管制議題對於軍售的限制

一. 軍備控制的理論

根據聯合國裁軍事務部（DDA, Department for disarmament affairs）在 1985 年所出版的《裁軍概況》中，對於軍備控制一詞所做出的定義是：「限制與控制軍備、軍隊、與後勤的數量、種類、佈署與使用的國際協商或者是單方面的措施」¹⁸，軍備控制與裁軍的內涵並不完全相同，軍備控制著重於「控制」的概念而裁軍則著重於「裁減」，過去蘇聯時代將軍備控制的概念包含在裁軍之中，在蘇聯瓦解之後，俄羅斯也使用軍備控制這一概念，但是兩者之間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軍備控制的概念起源於冷戰時期，主要的目的是提高國家安全，藉由裁減彼此之間的軍事設施，以確保不會出現單方面佔優勢的情況發生，俄羅斯強調在各國訂定軍備控制政策時，並不會接受有損於國家安全的政策。冷戰期間，在美國的軍事戰略中，認為軍備控制僅是一個次要性的議題，蘇聯也只將軍備控制作為推展外交工作與拉大軍事實力差距的一項政策工具。直到 80 年代中期以後，美蘇意識到核子武器對人類所產生的傷害，才開始認真處理此議題，戈巴契夫便公開表示：「最高的智慧並不在只為自己著想，而且還會損人不利己，大家必須在相同的安全下生活，因為核子時代的恐懼會導致政治與具體行動上的不可預估性」¹⁹。

美俄之間的軍備控制主要的原則是一方面限制防禦性彈道導彈系統的部署，另一方面對於攻擊性戰略武器進行逐步的裁減。其目標就是要保持美俄兩國之間的軍備實力平衡，避免發展刺激對方發動第一擊的武器，並且增加雙方的軍事的互信程度與透明度，也就是信任建構機制（CBMs）。蘇聯解體之後，美俄之間的軍事力量開始出現落差，美國開始強調自身的絕對安全，使得雙方之間從過去的限制核子武器轉為防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流向第三世界，因此除了繼續推動裁減核武外，並且開始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

本章節並根據季北慈（Bates Gill）在「亞太軍火競賽」一文中所提出的理論，提到各國對於軍備控制所考慮的三項因素作為解釋：

（一）經濟因素

季北慈指出在冷戰結束後，軍品出口將會取代過去以國內市場，以解決因為國

¹⁸ <http://disarmament.un.org:8080/cab>

¹⁹ 維爾弗里德·洛特（Wilfried Loth）；朱章才譯，《和解與裁減軍備》，（台北：麥田出版 2000 年）頁 273。

內訂單減少所造成的經濟困境，以生產傳統軍火為主的國家都出現失業、外匯存底減少的問題。

在俄羅斯，因為經濟改革失敗所產生的困境以及在政治情況的不穩定，使得軍火商有機可乘，無視武器管制協定的約束，開發各項具有市場潛力的武器系統，而這也使得俄羅斯在冷戰結束之後的軍火交易在大幅衰退後又再度攀升。蘇聯時代對於軍火輸出有相當嚴格的控管機制，但是解體後因為經濟惡化，由於輸出軍火的獲利頗豐，執政者極有可能放寬對於軍火輸出的控管來舒緩經濟上的困境，另一方面，國家對於軍隊所編列的預算日益縮水，軍隊紀律也隨之渙散，俄羅斯的武器也極有可能從軍中流出，形成管理上的漏洞。

根據 Anthony H. Cordesman 的研究²⁰指出，俄羅斯軍火輸出總額在 93~95 年間下降，但 95 年之後便開始攀升，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中心（SIPRI）也指出，俄羅斯將會繼續提供給伊朗、中國、印度以及東南亞各國各種新式的武器系統。而在美國方面，自老布希政府開始，為解決經濟問題，出售 150 架 F-16 給予台灣，柯林頓政府上台之後，為提振低迷的景氣，更修改政府對於武器出口的管制政策，這樣的放寬使得美國每年可以獲得超過 400 億美元的收入。在法國，因為國防預算逐年被刪減，並且進行逐年的裁軍，這使得法國國內對於軍火的訂單銳減，軍火商也必須進行外銷工作以減少損失；在英國，根據英國國防部的統計，約有 40 萬人從事軍火工業，一旦轉變英國的國防政策，將會影響到這 40 萬人的生計。

（二）政治-國家安全因素

除了經濟因素之外，美俄決策者在面對軍備管制的議題上，尚須考慮到政治與國家安全的問題，冷戰後初期的世界局勢正處於一種舊有秩序瓦解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推動全球性的軍備管制具有相當程度的困難。在 1995 年柯林頓主政時代的美國，曾經明確的表示國家安全因素將會是影響美國軍備輸出政策的最主要因素，並且提出五項具體的原則：1. 確保美國在軍事科技上仍保有絕對優勢；2. 在美國主導優勢的大前提下，協助盟邦抵禦外來侵略；3. 避免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以確保美國的區域安全；4. 提升美國和平解決爭端的能力；5. 提高美國國防工業的穩定性，除了滿足美國國防的各項需求外，也要能夠保持低成本的軍力優勢²¹。

在冷戰結束之後，快速興起的區域性強權，為確保在區域中的軍力優勢，也同樣以國家安全為由，不願意在軍備管制的議題上作出承諾，使得軍備管制出現許多挑戰。另一方面，另一個武器出口國-俄羅斯，在冷戰結束後成為僅次於美國

²⁰ Anthony H. Cordesman, *The Strategic Impact of Russian Arms Sales and Technology Transfers* (CSIS Apr 1999) p.15.

²¹ 季北慈，「亞太軍火競賽」，《後冷戰時期亞太集體安全》，(台北：業強出版社 1996)，頁 396。

的武器出口大戶，俄羅斯並未在軍備管制的議題上作出太多承諾，但是俄羅斯也注意到國家安全上的考量，除了自身仍保有一定程度的軍事實力外，在對外出售軍火時，也保有一定程度的技術差距，並不會將最先進的武器出售給對於國家安全有影響的軍購國。

（三）科技-工業因素

季北慈也指出，除了國家安全因素之外，經濟與科技因素也正逐漸取代國家安全這項因素，以美國為例，行政部門所關切的，是武器技術的轉移是否會對美國的優勢形成衝擊，特別是在軟硬體的設計方面是否能夠繼續保持競爭優勢。

同樣的，俄羅斯在對外軍售時，也考慮到這一因素，對於模仿能力較強的中國，其所售予武器的技術水準較低，同時在技術轉移上也多所保留與限制，目的就是為了保持與中國之間的技術差距，但是對於仿製能力較差的印度，便未給予較多的限制。

基於上列三項主要的因素，要推動全面性的軍備管制有其困難，而目前國際上兩個主要的管制武器的體制-聯合國傳統武器登記制度與多邊出口管制委員會也存在著許多運作上的困難，使得武器管制仍無法全面性的推動，僅能在區域中進行小幅度的多邊與雙邊裁軍。

二. 亞太地區的軍備控制

冷戰時期，美蘇之間爭奪亞太地區的主導權，積極的在亞太地區部屬大量的軍隊，並且向亞太地區輸出大量的武器，其中又以傳統武器為主，而這也對亞太地區形成安全上的威脅，因此在冷戰結束之後，亞太地區開始探討關於軍備控制的議題。

在 1987 年戈巴契夫發表新思維以後，蘇聯開始調整其對外政策，大幅降低與美國之間軍事以及政治上的緊張關係，蘇聯解體之後，東西冷戰的情勢瓦解，亞太地區的局勢也隨之改觀，過去壁壘分明的情況已不復見，取而代之的是彼此之間的經貿交流，雖然各國之間的互動頻繁，但是各國的軍備競賽並未停止，東北亞地區更是僅次於中東的軍火庫。歸究其原因，可能來自以下幾點：

（一）區域內朝向多極體系發展

70 年代中期以後，美中蘇三國之間形成戰略大三角，這樣的互動促使亞太地區朝多極化的方向發展，除了傳統的美中蘇外，日本憑藉其經濟力量發揮其區域中的影響力，特別是在東北亞地區，日本的影响力更是與美中俄三國相互抗衡，在朝鮮半島的問題上，日本更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俄羅斯在蘇聯解體之後繼承蘇

聯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但影響力已不如過去強勢，不過在近年來的努力經營下，俄羅斯在亞太地區仍保有相當的影響力。東南亞國協與印度的影響力在冷戰結束後開始攀升，特別是東協國家強調區域事務的自主性，但是東協國家內部也隱藏軍事衝突的隱憂，印度也藉由核武試爆向世界展現他在軍事上的實力，因此亞太地區逐漸朝向多邊六角形勢。

（二）區域內大國關係處於重新調整的磨合期

在冷戰結束之後，各國為了適應新的國際情勢與新的戰略需要，開始調整與重新定為各國之間的相互關係，1993年，葉爾欽訪問日本，發表《東京宣言》，藉此宣示與日本的和平關係，1994年，俄羅斯與印度簽署了加強印俄雙方合作的宣言，1996年，俄羅斯與中國簽署「戰略協作伙伴關係」，同年，印度與中國也簽署了「建設性的伙伴關係」，1997年，美國與中國簽署「面向21世紀的戰略協作伙伴關係」，這一類的和平宣言或是戰略伙伴關係有別於冷戰時代的戰略合作關係或是盟友關係，兩者之間具有本質上的差異，冷戰時期的盟友關係通常具有在軍事上針對第三國的意義，例如美日安保條約。而冷戰後所簽署的伙伴關係，通常強調不針對第三國，並且不用具有結盟性質的用詞，而其宣示意味往往大過他的實質效用，其所強調的是彼此之間的合作，與相互平等與尊重，同時不具有排他的性質。

亞太地區會出現這種轉變，探究其原因，有四點：

1. 過去冷戰時代美蘇兩大強國相互爭奪區域主導權，但是冷戰結束之後，這種情形並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美國逐漸主導整個國際環境
2. 各國開始進行經濟上的整合工作，彼此之間的經濟相互依賴的程度也越來越高，只有提高彼此之間的合作，才能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反之，若是為了意識形態而發生軍事衝突，將會傷害各國的利益，因此各國之間仍會儘量避免發生戰爭，但是關於爭奪資源的戰爭卻沒有停止過，這是例外的地方
3. 各國都面臨了跨國犯罪、環境污染、恐怖主義等跨國界的問題，這必須要加強彼此之間的合作才能處理這一類的問題
4. 多邊主義與雙邊主義同時進行，在亞太地區，由於歷史因素，有許多過去冷戰所遺留下來的問題，必須以多邊會談的模式進行協商，但另外一方面，各類的雙邊關係也不斷的發展。

（三）亞太地區安全機制的主導權，仍繼續為美國所控制

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的力量無法與美國抗衡，美國成為國際體系中唯一的超級大國，由於美國內部一直存在著「中國威脅論」，將中國視為未來與美國爭奪霸權的對手，以及美國經濟越來越依靠亞太地區，因此美國越來越重視亞太地區的戰略重要性，逐漸的將其軍事戰略的重點由歐洲轉移至亞太地區來，也正因為

如此，美國仍不輕易放棄在亞太地區的駐軍²²，在 1995 年美國國防部所做的東亞安全戰略報告指出，美國將放棄 90 年代初期所制定的自東北亞逐步撤除軍隊的計畫²³，並且維持 10 萬人的駐軍，此數目約與美國在歐洲的駐軍相當²⁴，以維持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嚇阻能力，並且加強與亞太盟國之間的軍事合作與交流，以維持美軍在亞太地區的優勢。

（四）區域衝突的問題逐漸受到重視

冷戰結束之後，在亞太地區的區域衝突逐漸浮現，在東北亞地區，朝鮮半島的問題起起伏伏，南北韓在 1991 年簽署了《關於南北和解、互不侵犯與合作交流協議書》，並簽署朝鮮半島無核化宣言²⁵，北韓並在美國的協助下，發展輕水反應爐的技術，北韓並向美國保證會繼續遵守《反核武擴散條約》。1994 年 6 月，南北韓雙方代表在板門店進行會談，並確定北韓領導人金日成將於 1994 年 7 月與南韓總統金泳三於平壤進行會談，但後來因為金日成病逝而使得會談未能如期舉行。1998 年，金大中當選南韓總統之後，提出對北韓的「陽光政策」，並鼓勵發展雙方的經濟與文化交流，北韓也對此發出善意的回應，並再 1999 年的聯合國大會時，提出關於南北韓兩國元首進行高峰會談的可能性。2000 年 6 月，南韓總統金大中訪問平壤並與金正日進行正式會晤，雙方達成了和解的共識，並簽署了「南北共同宣言」，其主要內容包括：

- （1）南北韓應該相互合作，並獨立自主的解決國家分裂的問題
- （2）同意雙方所提出的統一方案具有相容性，南北雙方將為統一進行合作
- （3）南北韓雙方將交換因為韓戰而分散的親友訪問團
- （4）南北韓將加強雙方在社會與文化的交流，增加雙方的互信
- （5）政府之間將儘快進行對話以實現雙方關於交流合作的承諾

而美國也開始積極恢復與北韓的交流，在經過聯合國對北韓的武器檢查，並且要求北韓承諾暫時停止導彈的試射後，美國逐步放寬對於北韓的經濟制裁，並於 2000 年 6 月 19 日正式解除對於北韓的經濟制裁。但是在 911 之後，美國與北韓之間的關係再度出現緊張的局勢，美國將伊朗伊拉克與北韓列為邪惡軸心國家，而北韓也頻頻於日本、南韓發生海上小規模衝突，並且宣稱持有核子武器，而這也為東北亞地區的安全投下不穩定的因素。而在東南亞地區，中國南海的主權問題，一直是東南亞各國與中國的爭端所在，在南亞，印度與巴基斯坦雙方以試爆核子武器來向對方示威，而中國與印度之間也一直存在著邊界的領土糾紛。

²² 目前在亞太地區的駐軍有，關島、琉球、日本、南韓，其中日本與南韓都有傳出要美國撤除駐軍的意見。

²³ 方永剛、唐復全，《大國逐鹿-新地緣政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9 月）頁 161。

²⁴ 駐札在韓國的美軍第二步兵師、第七空軍聯隊，約有 3 萬 7 千人，駐紮在日本的有第三海軍陸戰師，第五航空司令部以及第七艦隊，總數約 5 萬 6 千人。資料來源：全球防衛雜誌 第 172 期。

²⁵ 陳峰君 王傳劍，《亞大大國與朝鮮半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2），頁 390。

（五）亞太地區的軍火成交額有逐年攀升的趨勢

冷戰結束之後，亞太地區各國對於軍火的採購，不減反升，除了受到波斯灣戰爭的影響，各國領導人認知到現代武器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因為蘇聯解體後，軍火商急欲脫手現有的資產的影響，而亞太各國普遍都具有不錯的購買能力，使得冷戰後，亞太各國的武器採購逐年攀升。

亞太地區武器的成交額自 1994 年的最低點開始逐步攀升，在 1997 年回到 1989 年的水準，達到 123 億美元，而這樣的數據要比 1996 年成長了 27.1%，而亞太地區 1998 年度的軍火貿易額佔全球軍火貿易額的 49%，相較於 1997 年也成長了 18%，成長幅度超過五成，可說是相當驚人的。在 1994~1998 年的 15 個主要武器進口國當中，其中有 8 個國家位於亞太地區，這 8 個國家包括台灣、日本、韓國、印度、巴基斯坦、泰國、馬來西亞與中國，台灣在 1994~1998 年間，因為二代戰力的更新計畫，使得軍火貿易額超過沙烏地阿拉伯，為世界第一²⁶，而印度與日本的軍火貿易額則分別為 41 亦與 40 億美金，分居世界第七與第八位。而中國則是在 1998 年之後急起直追，光是 1998 年就高達 150 億美金，在 1998~2002 年之間，總數更高達 880 億美金，位居世界第一²⁷。而東協國家在 1994~1998 年之間的軍火貿易額也有 30 億美金的水準。

亞太地區所採購的傳統武器，所採購的方向與內容都往高科技方向為主，並非採購二手或是世代較老的產品，內容包含各類軍品與電子作戰設備，其中台灣、日本、印度更以加強空防與海防實力為主。除此之外，導彈系統的擴散再亞太地區也是個日益嚴重的問題，其中中國是亞太地區中擁有數目最多導彈數目的國家，而這也造成週邊國家的緊張，而印度與巴基斯坦也開始積極的發展出導彈技術，甚至兩國相繼試爆核彈，使得亞太地區的安全更值堪慮。

比較亞太各國國防預算，可以看出亞太各國在軍備採購的成長幅度相當驚人，以印度為例，印度在 1999 年的預算就高達 107 億美元，相較於 1998 年成長了 14%，印度政府更特別提撥 120 億美金作為強化海軍裝備的預算，其中包括自行建造兩艘潛水艇、三艘巡洋艦等，印度更與俄羅斯達成軍事上的協議，俄羅斯將授權印度生產 150 架蘇愷-30 戰機，並提供飛彈與飛彈發射系統的技術，印度也採購了俄羅斯的長程轟炸機以及早期空中預警系統，並且購入了俄羅斯「戈什科夫海軍上將」航空母艦，印度的第一艘核能動力潛艦也將於 2006 年下水，2000 年 10 月，印度又再度向俄羅斯採購 300 輛 T-90S 戰車以充實陸軍戰力²⁸。

東北亞的南韓則是積極研發具有 500 公里射程的彈道飛彈，並且部署了自美國

²⁶ SIPRI arms transfers database 2003. <http://www.sipri.se/>

²⁷ Ibid.

²⁸ “India, Russia to tighten military embrace” (New Delhi Dec.17,1998 Reuters)

引進的 AIM-120 中程空對空飛彈，南韓國防部更提出一系列的武器升級計畫，包括研發生產「飛馬」短程防空飛彈，並且購入 100 架以色列製的「HARRY」無人飛機，以進行地面攻擊任務，另外更計畫購入俄羅斯基洛級（Kilo）潛艦，南韓更計畫要在 2006 年發射第一顆自製的軍用衛星。

亞太地區高科技武器的擴散，使得區域的安全產生許多變數，除了美國、俄羅斯積極的對亞太區域出售武器，亞太國家對於武器的研製能力也有長足的進步，這使得區域間的平衡出現不穩定的變數，進而引發安全上的危機。

（六）亞太地區正逐漸自金融風暴中恢復，地區和平成為共識

自 1990 年代起，亞太地區的經濟成長率每年都能夠維持 6%~7% 的水準，相較於其他地區，可說是經濟較為活絡的地區。但是 1997 年的金融風暴使得亞太國家的經濟受到嚴重的衝擊，特別是東南亞國家無一倖免，經濟議題頓時成為亞太各國執政者所關注的焦點。為了能夠順利度過金融危機，亞太地區國家積極的加速金融業務的改革以及制度面的創新，進行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改革，解決不良債權，並且改變政府職能，剪斷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係，以加速在金融風暴中脫困。

亞太地區各國將經濟發展視為首要任務，並且亞太各國之間的經濟相互依存的程度也越來越高，也因此，經濟的互賴促使亞太各國在面臨衝突時多半願意以和平的手段來化解紛爭，也唯有在和平的國際環境中，經濟才得以發展，因此和平仍是亞太各國之間的共識。

三. 亞太地區軍備控制的特點

亞太地區的軍備控制著重於各類信心機制的建立，亞太地區一直存在著許多邊界問題以及小規模的武裝衝突，因此直到 80 年代中期以後，才開始著手進行雙邊的實際裁軍行動。而亞太地區的軍備控制則可以歸納出下列幾點：

（一）單方面的裁軍帶動雙邊與多邊裁軍

1987 年，戈巴契夫發表新思維之後，開始推動蘇聯在亞太地區的撤軍，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更大幅削減駐紮在亞太地區的兵力，除了撤除在越南金蘭灣的大部分海空軍外，更撤除在外蒙古的所有駐軍。而美國也自 1991 年起制定了在十年內分三階段自亞太地區減少駐軍的計畫，計畫在 1992 年 12 月之前先行撤除在南韓與日本的部分駐軍並且撤除在菲律賓的蘇比克灣基地。

這種單方面的撤軍帶動區域整體情勢的緩和，蘇聯與俄羅斯進行裁軍的動作，有助於俄中關係的改善以及降低美俄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對抗。俄羅斯的裁軍動作

所產生的影響便是中蘇兩國在 1990 年 4 月簽署了《關於俄中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與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指導原則協定》，提供兩國之間的邊界撤軍的法源依據，也進一步帶動接下來一連串的裁減軍備的動作。1997 年，俄羅斯與中共、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共同簽署《關於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的協定》，協議中規定，將俄羅斯與相鄰四國邊境地區的軍事力量裁減至睦鄰友好關係的最低標準²⁹，使彼此之間僅維持防禦性，彼此之間互不使用武力與使用武力威脅，不追求單方面的武力優勢，彼此之間部署於邊界的軍事力量不相互侵犯，並且裁減部署於邊界內側 100 公里範圍內之陸軍、空軍以及其他武裝部隊，並明定各簽約國駐紮在邊界的最高軍隊員額數為 13 萬零 4 百人，並且交換彼此之間邊境地區軍事力量的相關資料，並對執行協定情況進行監督查核的工作。此協定是亞太地區第一個多邊的裁軍協議，對於區域的穩定與和平有正面的幫助。

（二）信心建構機制具有較為大幅度的進步

冷戰結束之後，亞太地區已由過去的雙邊信心建構機制進展為多邊信心建構機制，各進一步發展出區域間的互信機制，許多國家更經由多種管道來參與信心建構措施的過程。而信心建構機制並不僅止於傳統武器的軍備控制，在防止核子武器的擴散也獲得相當大的進步。

在雙邊信心建構機制上，俄羅斯與中國在 1994 年 7 月與 9 月分別簽署《關於預防危險軍事活動的協定》與《俄羅斯聯邦總統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互不將戰略核武瞄準對方的聯合聲明》³⁰，這兩項協議對於俄中兩國之間的互信具有正面增強的效果，雖然互不瞄準協議的宣示作用大於實際作用，但是仍有其正面的影響，而美國與中國之間亦於 1998 年 1 月簽署了《關於加強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的協定》³¹，而這也是美中之間所簽署的第一個關於軍事領域信心措施的協定，進而有助於避免美中兩國海空軍發生意外衝突或是誤判，同年的 6 月，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更與美國總統柯林頓共同宣布，表示不會將的戰略核子武器瞄準對方，而這也是美中雙方在關於核子武器方面所達成的第一項雙邊信心建構機制的協議。俄羅斯、美國與中共之間更彼此建立了熱線，以維持溝通管道。但是中美之間的互信機制在 2000 年於中國南海發生軍機擦撞時受到嚴重的挑戰，而這也顯示出兩國之間的互信機制，仍然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來進行磨合。

中國與日本也於 1994 年開始進行外交官員與軍方人員之間的安全對話，1998 年 2 月中共國防部長訪問日本，中日雙方並就中日防衛交流達成若干的協議，並

²⁹ 羅德明 (Lowell Dittmer), 「The Sino-Russi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Taiwan strait embroilment (中俄戰略夥伴關係及其對台海紛爭之意涵)」, 《俄羅斯學報第二期》(台北: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 2002), 頁 45。

³⁰ 李靜杰, 「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俄羅斯學報第二期》, 頁 103。

³¹ 前揭書, 頁 104。

未中共與日本之間就信心建構機制的工作預作準備。2000年8月，中日兩國外交部長就制定海洋探測船進入對方經濟海域相互通報議題達成共識，同年10月，中共總理朱鎔基訪問日本，雙方就政府設置熱線電話、中共海軍與日本自衛艦隊互訪達成協議。

在南亞的印度也積極的周邊國家建立信任機制，印度除了繼續與俄羅斯維持良好的政治、軍事、經濟關係外，在1993年9月，印度與中共簽署《關於印中邊境實際控制區域保持和平與安寧的協議》，1996年11月印度再與中國簽署《關於在邊境實際控制區域軍事領域建立信心措施的協定》³²，該協定規定雙方不進行威脅對方或損害邊境地區和平與挑釁對方的任何軍事活動，在邊界問題獲得解決以前，雙方將會嚴格遵守中印邊境的實際控制區域，任何一方的活動都不得跨越邊界，依據雙方所商定的最高限額進行裁軍以及限制邊境軍隊的部署，並且不在邊境地區舉行針對對方的軍事演習，並嚴禁軍機等相關軍用飛行器探測器飛越對方領空，防止任何危險的軍事行動，並加強邊境地區軍事人員的交流與互動。而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也取得類似的協議，並且早在1988年雙方便簽署互不攻擊對方核能設施的協定，不過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在此之後並沒有在出現更大幅度的進展，雙方也因為核彈試爆而使得關係陷入緊張的情勢。

大國多邊的信心建構措施所獲得的主要進展就以俄羅斯與中國、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國於1996年4月所簽署的《關於邊界地區加強加強軍事領域信任協定》為代表，這是亞太地區第一個以雙邊多國的方式建立信任機制。而在1997年的4月，五國再度簽署《關於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的協定》，除了強化信心機制更進一步推動彼此之間的裁軍，其後更在2001年6月將烏茲別克納入，成立「上海合作組織」³³，並將焦點集中於裁軍與加強五國邊境軍事互信，並且在未來將有可能繼續擴大，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蒙古都有可能加入此組織，而功能也將擴大到政治及其他領域。

在東南亞，東南亞國家國協在信任機制上，也有大幅的進步，1994年7月，東協論壇（ARF）的成立就是以促進成員國建立信心機制為主要任務，1997年3月，東協論壇在北京舉行建立信任機制會議，並在同年12月決定每年舉行東協+3與東協+1的元首非正式會晤，而2000年7月，在泰國召開的東協年度外長會議中，作出由上屆、本屆以及下屆主席國的外長共同建立一機構，作為預防與迅速解決跨國衝突的機構，並且強化彼此之間的信任機制。

³² 張文木，「印度的大國戰略與南亞的地緣格局」，《亞太戰略場-世界主要力量的發展與角逐》，（北京：時事出版社 2002年），頁168。

³³ 徐瑞雯，「普丁政府的亞太政策」，《俄羅斯學報第二期》，頁156。

四. 軍備控制與軍售之間的互動

就軍備管制的目標而言，主要的方向都是因應全球武器的擴散，從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到傳統武器的轉移，從而嚇阻潛在敵國獲得改變區域軍事平衡的利器³⁴。而其具有三個主要的目標，第一，降低戰爭的風險，以美國的國防戰略考量為例，主要是藉由某種形式的嚇阻來降低爆發核戰的風險，因此軍備管制的任務為建立、強化與制度化相互嚇阻的手段，並盡可能減少威脅狀態的發生；第二，如果軍備管制可以成功的在較低的軍備水準上提供雙方相等的安全保證，則可以引導各國減少武器的部署，進而降低國家的國防經費；第三，假設發生戰爭，則軍備管制可以降低戰爭所造成的傷害。

而根據 Jeffery A. Larsen 與 Gregory J. Rattary 所編輯的「邁向 21 世紀的軍備管制」³⁵中所指出，軍備管制可分為三大類：1. 為自己的軍備管制 (arms control for us)，為了正常化與鞏固北約與前華沙公約會員國之間的軍事合作關係而採行的措施，包括戰略武器裁減條約與歐洲傳統武力條約 (Conventional Armed Forces Reduction in Europe, CFE)，透過自身在軍備上的限制，向對方發出善意的和平訊號；2. 為全體的軍備管制 (arms control for everyone)，透過聯合國的架構，關於生物與化學武器公約的簽訂，就是企圖將限制範圍擴及各國的具體成效；3. 為對方的軍備管制 (arms control for them)，針對他國的限制措施，我方國家樂於見到核武以及長程彈道飛彈在我方的安全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我方希望透過禁止擴散制度，誘使、說服或施壓的方式，使其他國家僅能利用傳統武器，而不去取得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近年來，軍火市場所呈現出幾個現象：1. 對於現有的武器市場規模而言，武器的需求必須達到軍火商的規模經濟，因此必須擴張海外市場以維持最低的有效生產規模；2. 美俄兩大軍事設備生產國都面臨國內市場競爭激烈，使得軍火商必須積極向國外尋求買主，而美國在武器出口市場中更具有主導的地位，再世界前十大的軍火公司中，就有八家公司是美國籍³⁶；3. 武器生產有全球化的趨勢，軍火商藉由全球化的佈局以降低武器的生產成本，而各國政府亦希望藉由此一過程來降低採購費用與獲得一定程度的技術轉移，而這種國際化的佈局在冷戰之後也成為一種趨勢，其最主要的考量還是基於節省製造成本以獲得最大的利益。

五. 小結

在亞太地區，軍備控制與軍備轉移兩種現象都相當興盛，一方面藉由信心機制

³⁴ 翁明賢，《全球化時代的國家安全》，(台北：創世文化出版社 2002)，頁 214。

³⁵ Jeffery A. Larsen and Gregory J. Rattary 編，《邁向 21 世紀的軍備管制》(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2000) <http://www.mnd.gov.tw/division/~defense/mil/mnd/mhtb/htmlpages/bookpage/443.htm>

³⁶ 李明正，《美國、俄羅斯、歐洲地區、中共與以色列之軍事工業發展趨勢探討》，(台北：時英出版社 2001 年)，頁 82。

的建立以進行軍備控制，另一方面，在具有衝突可能性的地區熱點，軍火成交的數字卻也節節攀升，而在亞太區域中，軍備控制與軍火交易兩者與國家之間的互動關係有強烈的關係，例如上海合作組織促使中共在中亞減低軍隊部署，並將重點放在打擊中亞的恐怖主義，但中共卻在東南沿海增加軍隊的部署，此舉引起週邊國家的緊張，進而引發週邊國家對於軍備的需求而引起區域中的軍備競賽。

因此，基於各項因素，特別是安全理由，軍備管制與軍備採購會持續進行下去，在國家財政許可的情況下，軍備採購將不會停止；另一方面也會積極的推動軍備控制，藉由相互信任與裁減軍備以避免發生軍備競賽的狀況。

在下一個章節，將繼續探討俄羅斯再軍備管制的協議下，在對亞太地區出售軍備時，所必須考慮到的區域戰略因素，分析俄羅斯如何在戰略因素與經濟考量中，如何取得平衡點以維持國家的生存與發展。